



见证七大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 李蓉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一座木石结构。为了避免在礼堂内出现两排阻挡视线的柱子，杨作材采用大的石拱代替了木梁。当地的木料，特别是能用作大梁的木料十分缺乏。而石料则是取之不尽，且石匠技术水平非常之高。所以，礼堂的主厅采用的是石拱结构。杨作材请温家沟农具厂造了一个五轮复式滑车，上边是三个轮子，下边两个轮子；又到新市场上定做了一根1寸来粗的长麻绳。每次吊装那些1米见方的大石头或梯形石头时，用这架滑车，只需两个人就能把它吊上去。这在当时就算是一个很进步的“现代化”工具了。

1942年春，中央大礼堂开始修建，年底竣工。竣工后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长35米，宽30米，高13米，屋顶呈穹庐状。设计将西式建筑与陕北窑洞的特点相结合，既节省木料，又坚固耐用，宽敞明亮。大礼堂分为大厅、舞厅和休息室三个部分，礼堂大厅可容1000人左右。建筑物的前面有个塔楼，塔顶上有一根旗杆，可从正厅上走过去挂旗。从外部看，礼堂像两层楼房，进去看又似窑洞结构。整个建筑庄严朴素，刚一建成，便成为当年延安最为高大雄伟的建筑。

参加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施工的工人，多是从绥德、米脂一带来的能工巧匠。米脂县杨家沟有一位木匠叫王应明，参加大礼堂的施工，被毛泽东称作“土工程师”。彭敏也参加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他是江苏徐州人，扬州中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他回忆，修建大礼堂，难的是建筑材料一样都没有。为了要结实，他选择的木材尽可能粗，石料也要选好的。后来胡宗南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许多建筑被炸毁，而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没被完全炸毁。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正门上方，是一个铸铁窗棂子，中间有一颗大的红五星。这个大红五星原是李家塔礼堂用的，后因故没有使用上，就把它用到了中央大礼堂。铸铁窗棂子是鲁迅艺术学院设计的，画的图案虽然挺漂亮，但是太繁琐，送到茶坊兵工厂后，负责铸造的同志将它修改铸造成了几个大格子。

庄重而热烈的会场布置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钟敬之专门设计了大会会场的布置，总的气氛是既庄重又热烈。主席台中央高悬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共六面鲜艳的党旗，领袖像挂在红旗的正中间。两边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

中央大礼堂两边的墙上挂有6个“V”字型的旗座。每个旗座上插着四面党旗，共挂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创建了24个年头。每个旗座上还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大厅后墙是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四个大字。

主席台前与左右两侧的长条桌后各放有扶手的靠背软椅，供主席团成员就坐。大厅里放着32排木质靠背椅，每排能坐24人，共200多张木椅。大厅中间留着甬道，两旁还可以安放一些椅子作为长座。七大召开时，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每人都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固定座位。主席台侧面还安放几张供大会工作人员主要是记录人员用的桌椅。

主席台的陈设十分朴素，只有几张条桌和十几把木椅。主席台上的长条桌上，摆着几盆盛开的山花，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顶端的石拱上，挂着红底镶着黄字的一幅巨大横联，上面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下面的红色横幅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4个大字。在七大大开幕式上，朱德向大会致辞，首先就提到了“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屋里开会”，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值得骄傲的事啊！

“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

——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文敬读

□ 王翠娟

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位于三位烈士的母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校内。这是一座1985年建成的汉白玉碑，呈方锥形，纪念碑正面镌刻着“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其余三个碑面分别刻有范士融、刘和珍和杨德群的生平简介。碑座正面是“碧血丹心”四个字，其余三面刻有“三一八”烈士碑记，全文如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炮击我大沽口海港事件。十八日，北京各界爱国人士在天安门前集会，强烈反对日、英、美、意、荷、比、西等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最后通牒”。会后，李大钊同志率领请愿团到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卫队的残酷镇压，向爱国群众开枪射击和用刀棍毒打，酿成了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在惨案中，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十三人受伤亡，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三同学当场中弹牺牲。为纪念烈士，爱国学友曾于和平门外师大院内建范士融纪念碑，在石驸马大街女师大院内建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现重建此碑，冀我新中国青年，继承烈士精神，发扬革命传统，为振兴中华贡献青春。

北京师范大学立

一九八五年三月

碑文简要概述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背景、过程与建碑缘起，揭示了上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勾结下的民族危亡境地，同时也体现了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驱除鞑虏的爱国精神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以救国救民为已志

三位烈士中，刘和珍最为人们熟知，这是因为鲁迅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低沉的呐喊，使刘和珍坚毅果敢、追求光明的形象深入人心。

在时代的洪流中，虽然三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但又有着许多共同点。一是为了革命接受教育。五四运动发生时，三人正值青春年华、思想活跃，深刻感受到国家危亡和社会黑暗，开始主动寻求救亡之路，主动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以改造旧中国、旧制度为己任。二是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在革命活动中，他们脚踏实地，崇尚实干、反对空谈。范士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25年前后，时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由于处事不公，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刘和珍等发动“倒杨风潮”，从宣传发动到与相关人员交涉、从奔走斗争到揭露事件真相，刘和珍都冲锋在前，带领大家勇于斗争。三是革命意志坚不可摧。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革命就意味着流血甚至牺牲，三人对此十分清楚。杨德群以“行不惑，教不倦，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革命先辈精神自勉，表达忠实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决心。刘和珍更在遭受迫害时言辞激昂：此身可死，此志不移，苟威武之再加，决誓死而殉校。他们三人其实也是当时立志反帝反封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缩影。

立即行动起来，坚决进行斗争

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在平津一带作战。12日下午，日军违反前一日通报给国民军的军舰数量与进港时间，公然掩护奉系战舰进入大沽口，并无理开枪挑起事端。迫不得已之下，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出港。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颠倒黑白，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提出5项无理要求，扬言48小时内不答复就以武力解决。

大沽口事件与最后通牒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八国最后通牒的实质是第二次

八国联军入侵的先声，决定发动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同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斗争。

3月18日上午，80多所学校及各界人士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刘和珍正患病，但她顾不上病痛，一面给学校打电话请求停课一天，一面拖着病体通知大家做好有关准备，并挨个寝室劝说同学们尽快行动起来。这次大会通过了以反对八国通牒为主要内容的8项决议。

随后，与会民众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飞任总指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各队的指挥和联络工作。范士融、刘和珍与杨德群手执旗帜，走在请愿队伍的前面，他们从天安门出发，高呼“严正驳复最后通牒”等口号，一路沿东长安街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队表面见段祺瑞等人的要求被无理驳回，激起了游行民众更大的不满。

正当此时，请愿人群突然遭到埋伏的军警开枪射击和大刀砍杀。由于范士融、刘和珍身处队伍的前列，枪响不久即被击中，杨德群因见刘和珍中弹倒地，毅然不顾安危冲过去救护，但就在她扶起刘和珍的瞬间也不幸中弹。据现场目击者事后回忆，刘和珍中弹后虽血流如注，却还能挣扎着向外爬行，但军警仍追上她猛击她的头部，于是伤重身亡，年仅22岁。这次惨案共造成47名烈士罹难、200多人受伤。

拉开大革命序幕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舆论沸腾、群情激昂，强烈谴责当局的反动行径。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声讨枪杀爱国学生和市民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常香玉是怎样捐献战斗机的

□ 刘金新

动和激励。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极度紧缺，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号召。时任西安香玉剧社社长的常香玉在积极捐款的同时，还提出一个惊人的想法：捐献一架战斗机。她立下一个决心：“用我的演出，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血汗，捐献一架战斗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义演引起轰动，老大娘给常香玉送来一篮鸡蛋。当时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需要15亿元旧币，筹措起来谈何容易！常香玉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们现在还买不起飞机，但我们剧社可以到全国各地义演，只要有人看戏，我们就能挣到钱，一点点地攒，半年不行一年，一年不行就两年，我就不信办不成！”为了表示捐献的决心，她毅然卖掉一辆用来拉戏箱的卡车，又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的资金。她还把年幼的孩子送到西安保育院，以便心无旁骛地义演。

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领香玉剧社全体成员从西安出发，开始义演。他们一路南下，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义演，得到了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得知此事后，大力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为，

特地委派西北局三名干部与香玉剧社同行，帮忙协调义演工作。

开封是常香玉少年成名的地方，也是义演的第一站。到达开封后，常香玉不知何故牙疼、脸肿，彻夜难眠。但捐献战斗机的艰巨任务刚起步，她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疼痛，圆满完成了在开封的演出。义演的第二站是郑州。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听说常香玉的事迹后，走了几十里路找到常香玉，给她送了一篮鸡蛋，让她补充营养，调养身体。这件事让常香玉大为感动，她看到了人民的爱国情怀，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在新乡演出时，戏院经理为支持常香玉的义举，坚决不收租金和水电费，并安排工作人员义务为剧社装台、卸台，支持他们的演出。

河南是豫剧之乡，豫剧团体较多，演出票价较低，剧社人员担心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便转向省外巡演。刚开始常香玉还担起到外省演唱豫剧会“水土不服”，没想到到各地群众反响热烈，场场爆满。在武汉演出时，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的邓子恢接见了常香玉，赞誉他们“这种精神了不起”，并为香玉剧社题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叶剑英特地邀请香玉剧社到广东演出以示支持，并在观看演出后，亲笔写下了“爱国艺人”四个大字相赠。这些都大大鼓舞了常香玉和剧社全体成员。

“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真实写照。从1951年8月7日至1952年2月



的段祺瑞执政府，揭露卖国军阀的真面目，提出民众必须团结起来，加紧武装和革命，并号召国民众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北伐。与此同时，各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表达愤慨，如鲁迅写就《纪念刘和珍君》，文中称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杨德群“沉勇而友爱”，坚信“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闻一多写下《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表示惨案带来的哀痛不会停止，也唯有如此，“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

鲜血教育了中国人民，自此中国民众不再对北洋军阀心存幻想，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决心进一步增强。4月，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段祺瑞于20日被迫通电辞职，其执政府宣告瓦解。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拉开了序幕。

大礼堂成为当年延安最为高大雄伟的建筑

杨作材设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时，把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和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然后钉在办公桌上，供大家查看。至于细部图，则是仍照老办法在施工现场临时画给工人们参考，或在木板上放个正式样子。

